

古代诗路之辨

《原诗》和正变研究

杨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古代诗“路”之辩

《原诗》和正变研究

杨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诗“路”之辩:《原诗》和正变研究/杨晖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633-7884-5

I. 古… II. 杨… III. ①诗话-中国-清代②原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582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 300mm 1/32

印张:7.25 字数:20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杨晖的博士学位论文《〈原诗〉正变思想的历史语境与现代阐释》要出版了，可以说我是本书从开题到成稿的见证者，所以很高兴为此书写序。

诗三百篇分正变，是汉儒的发明。整理《诗经》的孔子并没有作这样的区分，他对诗的功能是做了区别的，诗有兴观群怨几种用途，还可训练说话能力，用于外交应对，并能充当生物志让人认识草木鸟兽的名称。而对于诗本身，孔子只要求温柔敦厚。对于诗三百篇，他也有一个总的基本说法，即“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虽然《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是否篇篇都“无邪”，后人是有争议的，如朱熹就认为《桑中》、《溱洧》之诗就算不上无邪。但比朱熹早生 1681 年的孔子要宽容得多，他认为这些作品在内容上都没问题：无邪。无邪，就是正。也就是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都是“正”的。但汉儒却从中分出了“变风”、“变雅”，以和“风雅正经”相对。

汉儒的这种说法，是一例非常典型的“话语创造”，也即是一种关于《诗经》意义的创造。他们根据作品的创作时代和政治情况，将《诗经》分出“正雅”、“正风”和“变雅”、“变风”来。按照汉儒的标准，十五国风中属于“正风”的作品止有《周南》、《召南》二篇，属于“正雅”的作品也只有《鹿鸣》、《文王》等篇，这和大量的“变风”、“变雅”作品相比根本不成比例。但汉儒创造的话语却广为后人接受，并在不断的复制中，完成了从关于《诗经》的“话语”到《诗经》的“事实”的转变。转变的结果是，人们可以商榷正变的评价，但却不会怀疑诗分正变的“事实”了。

祖师爷已经有定论的《诗经》，汉儒为什么还要横生枝节再加划

分？这也许是话语自身增殖的需要，任何一种话语现象，如果不能在其留传过程中不断增加或改变意涵以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论，那么它的生命也就在那一刻终止了。消弭争论对于经济行政活动也许是一幸事，但对于话语却是一道屏障。孔子关于《诗经》的话语，如果不是后人不断地增加或改变对它的言说，恐怕早就被屏蔽在人们的注意圈之外了。不过诗分正变的发明，更重要的动因可能还是在于政治。孔夫子虽然也是很政治的，但他谈诗却相当平实，并没有固执于某时某地的诗一定是其时其地的社会政治的产物。汉儒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开口说诗就念念不忘突出政治。整个一篇《诗大序》就是对《尧典》“诗言志”的彻头彻尾的政治化解读：“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也就是说，即使在政通人和时代，风雅正经也是君臣之间的一种猫鼠博弈，我要用诗来管教你，你要用诗来讽喻我，同时还要防止被你吃掉。而到了王道衰亡年代，变风变雅更直接是失政废礼的政局的产物了。

汉儒喜欢谈政治，有多少是出于古代士人的政治情结，有多少是出于体制压力下的不得已，是可以探讨的。据朱自清先生说，风雅正变说是汉代郑玄所创建的。但这位大儒却是非常厌恶政治的人，他早年“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但东汉党祸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只得解散学生，杜门不出，隐修经业。汉灵帝末年，党禁解除了，深受政治所害的郑玄已经六十岁了。权倾一时的大将军何进听得他的大名，要征辟他做官，郑玄被迫去面见何大将军。尽管何进对他“礼待甚优”，他还是连夜逃亡了。董卓专权时，郑玄又被推举为赵相，幸亏道路不通免了这场麻烦。袁绍强盛时，有一次派遣使者邀请郑玄大会宾客，席间郑玄舌战群才，众人莫不嗟服。当时泰山太守应劭想做他的学生，别人巴不得有这样的门生，郑玄却对这个有权有势的大员“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袁绍表奏他做左中郎将，郑玄也称病推辞了。就是这么一个逃避政治、一心“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的人，谈起诗来却是念念不忘政治。

郑玄论诗喜谈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却厌恶政治，这两者之间的反

差,也许可以让我们揣摩中国文人内在世界的一些信息。汉儒强调诗有正变,正变是由政治得失、风俗隆污而定,崇正而诎变,这样的价值判断其实隐含着对险恶多变政局的态度立场。通过论诗谈正变,也符合他们对诗“主文而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主观认识或希望。汉以后近两千年来,中国统治者的姓氏和种族有变化,但专制集权的体制基本固定下来了,且有愈加酷烈的趋势。汉以后的诗论家在具体的价值选择上,可能和汉儒有所不同,有的人“崇正”,有的人“主变”,甚至也有人如宋人叶适质疑诗分正变的合法性,但以时论诗的路子还是一路延续下来了,它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诗学理论传统。以时言诗,其实质是以政论诗。由此而论,清初叶燮的正变思想就容易见出它的突破和积极意义了。

叶燮正变思想的新创之处,正是突破了“正变系乎时”的传统,摆脱了政治的单一视角,提出了以诗言时的观点,即“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系乎时,系乎诗,一字之差,但其中观念完全不同。以诗言时,其实质就是否定以政论诗,这使叶燮在古代诗学领域独步一时,在诗学理论史上别开生面。其中我们已可窥见后来西方新批评的一些影子,但叶燮要比他们早两个半世纪以上。也可能是太超前了吧,叶燮的正变理论相比他的“理、事、情”和“才、胆、识、力”说,较不容易为人接受,相反还受到别人的攻讦。杨晖当初说他读《原诗》有一些不同他人的理解,就是抓住了这个地方。我一直以为,治古代文学理论,关键在于读出前人没有读出来的东西。有了自己的理解,论述就不至于停留在罗列归纳前人的旧识上。所以当杨晖提出能不能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论题时,我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在两年时间内,杨晖在和师友的反复切磋中,思考逐渐拓展和深入。拓展体现在把叶燮的正变思想放在整个中国诗学领域来探讨其观点的来龙去脉,深入则表现在挖掘叶燮正变观形成的深层原因以解读其精神意涵。但把思考的东西变成文字,乃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初次接触杨晖的人,会从他嘻嘻哈哈的外表以为他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其实杨晖的心很细,做事很周密。为了搞清古代诗论中正变观念的源流,他阅读了大量的古籍。而为了弄清叶燮的思想渊源,他广泛涉猎

了清初政治、文化、杀戮和文字狱方面的文献。杨晖攻博期间,也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时不时有一些不是个人可以控制的事情来干扰思考。杨晖个人也有许多烦心的事情,他是拖家带口的人,他在上海读书,他的妻子也考入上海另一家大学读博,他最耽心的是独自留在无锡一所寄宿学校念高中的儿子。像所有的中国家长一样,为了儿子的学业和高考,杨晖是大伤脑筋。我还清晰记得有一次他突然从无锡打电话给我告假,说太湖蓝藻爆发,无锡全城水荒,他是匆忙中赶回家为儿子解决饮水问题的。由于阅读量大,杨晖有几次不无忧虑地表示可能来不及完成论文,不过最终他还是如期完成了工作,而且还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的甘苦我当然是知道得最清楚的。

杨晖的论文在中国诗学正变观念研究史上,足可充作一篇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杨晖的论文自然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全书的结构。不过本书以后若要修订,我认为,最值得花力气的地方是加强对叶燮个性方面原因的研究。文学研究都是话语的叙事,它和所有的叙事活动一样,都要受到个性因素如性格、经历、趣味和想象特点的影响。越是有创造性的理论,就越是受创造主体的个性的影响。理论研究的这一视角,现在还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囿于传统的认知,我们总是觉得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业,文学研究则是普遍规律的寻求;前者需要考虑个性的作用,后者则要尽力排除个性的影响。现代心理学、创造学和叙事学等领域的研究,早已破除了这样的迷思。叶燮独树一帜的诗学理论创造,也是和他的个性分不开的。

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明末进士,官至工部主事,明亡后削发为僧。叶燮自幼聪慧异常,过目成诵,43岁时也做了进士,不过是新朝的进士,并选授宝应县令。按说得官不易,小心做人才是。但清初康熙早期国家多难,连一向物产丰饶的江南也差不多连续十多年大灾,又加三藩叛乱,民不堪苦。叶燮“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职”。官丢了,他也不以为意,反以和同年进士、时为嘉定知县的名儒陆陇其一起罢官为幸事。当年文坛魁首汪琬名满海内,叶燮却总是发文论难,和其互相讥嘲。及至汪琬去世,他却将所有批评汪琬的文章付之一炬,并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叶燮性喜山水,几乎游遍海内的名山大川。到了76岁高龄,人家都已经一动不如一静以俟时

日,他却“犹以会稽、五泄近在数百里独未游为憾。复裹粮往,归遂疾。逾年卒”。在这里之所以把《清史稿》上的本传复述一遍,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叶燮绝对是性情中人。人有非常之性,必有非常之思。从个性去探讨叶燮的理论创造,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角度,也是非常好玩的事情。不知杨晖以为然否?

杨文虎

2008年8月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节 叶燮“正变”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1
第二节 理论视点、方法和基本观点	12
第三节 选题意义	16
第一章 叶燮“正变”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	20
第一节 晚明对传统的重新审视	22
第二节 晚明的诗学背景	39
第三节 清初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	54
第二章 传统“正变”思想的流变	66
第一节 “正”与“变”	67
第二节 “正变”观念的产生与诗学转向	78
第三节 “正变”观念的演变	88
第三章 叶燮“正变”思想的现代阐释	99
第一节 “正变”的边界与维度	100
第二节 “正变系乎时”	112
第三节 “正变系乎诗”	124
第四节 “诗变”的理论依托	147

第四章 《原诗》“正变”的比较研究	170
第一节 《文心雕龙》“通变”与《原诗》“正变”	171
第二节 《诗源辩体》“正变”与《原诗》“正变”	188
结 语 古代文论原创性的当代意义	206
参考书目	212
后记	219

绪 言

第一节 叶燮“正变”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叶燮的诗学思想主要见于《原诗》^①以及他的部分诗序、书信之中。《原诗》全书计四万多字。它规模宏大,逻辑严密,思考深透,在中国传统诗论中独具特色。特别在以诗话形式为表达思想主要方式的明清之际,他采取了更具逻辑性与思辨性的“作论之体”(《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197卷),追求理论品味,独树一帜。《原诗》“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沈珩《原诗叙》)。内、外两篇又各分上、下两部分,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具内在逻辑的四个部分,其内容大致是:内篇(上)为诗歌发展理论,内篇(下)为诗歌创作理论,外篇(上)为诗歌批评理论,外篇(下)为诗歌批评实践。《原诗》以诗歌的流变为线索,针对明代诗学中的复古与反古思潮,提出了源流正变、才胆识力、理事情、死法与活法、陈熟与新生等诸多理论问题,体现出较高的理论品位,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论述的逻辑性在中国古代文论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 《原诗》研究概述

《原诗》自1686年成书以来^②,对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① 本书中有关《原诗》的引文均出自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原诗》(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② 学术界对《原诗》成书时间的看法基本一致。叶朗认为:“林云铭在《原诗叙》中说他在丙寅(1686)九月被叶燮请到家里看《原诗》。另一沈珩的《原诗叙》也写于丙寅十月。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叶燮的《原诗》是在1686年,也就是他五十九岁时定稿的。”(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页。)陈良运认(转下页)

一是清代人的点评；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八十年代；四是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在理论层面上对《原诗》进行研究的，据现在可见到的资料，大约是从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始的。如果这样的看法成立的话，《原诗》的研究历史也不过仅仅六十多年。

第一阶段为《原诗》成书后的一段时期。就所见材料看，《原诗》在其完成之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仅有沈樾惠、沈珩、林云铭、汪森、储雄义等人提及^①，这可能与它针砭时弊，得罪时贤，戴罪之身（为官遭弹劾），且隐居苏州横山，处于社会边缘有关，再加上纪昀说它“多英雄欺人之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集部五十），其诗学思想不为时人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是在现代意义上对《原诗》研究的起步阶段，集中表现在文学批评史当中，以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代表。^②朱东润先生第一次以现代的论述方式和学术视野开启了《原诗》研究的新纪元。郭绍虞进一步为《原诗》正名，认为它“可以当得起称能建立一种体系的

（接上页）为：“《原诗》成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页。）蒋寅赞同陈良运的说法。（蒋寅：《叶燮的文学史观》，见《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另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根据林云铭、沈珩的《原诗叙》推断，“《原诗》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① 沈樾惠《原诗跋》、沈珩的《原诗叙》、林云铭的《原诗叙》分别见于霍松林注释《原诗》的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汪森《小方壶存稿》卷三有《读叶已畦原诗一编用昌黎醉赠张秘书韵有赠》，系于本年，康熙四十六年刊本；储雄义《浮青水榭诗》卷一也有《阅叶文星期原诗内外篇有感》，康熙甲申序刊本。

②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据《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说：“一九三一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一九三二年秋间，重加订补，一九三三年完成第二稿。一九三六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开始排印。”（《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虽然三十年代没有印出，但从完成的时间看基本上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修订版。

书”，肯定它“用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以批评文学”。^①与此同时，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昭和二十四年，即1949年出版《清代文学评论史》^②一书，其中的第五章“诗坛上自成一家思想之抬头”中，首先介绍的便是叶燮。“内篇”也被他解读为“叙述尊重自成一家”^③，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第三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研究很少。^④叶燮真正被关注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在郭绍虞先生的主持下，霍松林先生对《原诗》进行校注，于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一标志性成果，为《原诗》研究提供了文本和素材。八十年代，几部较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史，如王运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蔡钟翔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黄葆真、蔡钟翔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等，均沿着郭绍虞先生的路，对《原诗》中的各种命题作出进一步的探讨。从美学的角度，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此同时还有几十篇相关论文发表。^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还出版了两本著作，即蒋凡的《叶燮和〈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和吕智敏的《诗源·诗美·诗法探幽》（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本理论专著。这一阶段的研究与第二阶段相比较，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的推进。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② [日]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作者在1949年的序言中说，此书是根据三十页左右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第七章“清代文学思想”部分扩大而成，着手研究于1922年。从研究的起步看，大约可以视为第二阶段。

③ [日]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④ 据查，大约有霍松林的《叶燮的反复古主义的诗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15日），叶朗的《论王国维境界说与严羽兴趣说、叶燮境界说的同异》（载《文汇报》1963年3月2日）等。

⑤ 这一段时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50多篇，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如敏泽的《叶燮及其〈原诗〉》（《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蒋凡的《叶燮〈原诗〉的理论特色与贡献》（《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任中杰的《叶燮论形象思维》（《北方论丛》1979年第4期），蒋述卓的《〈原诗〉诗人主体性》（《古代文学研究论丛》1986年第10期）等等。

第四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从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原诗》作整体性的研究有所减少,但一些具体问题则得到进一步深入。那些过去被有意无意遮蔽的问题得到重新发现,特别对叶燮文学批评史观的认识有所深化。^①本世纪初,人们再次关注叶燮,出现了研究的小高潮。对他的文学发展观作出了有效的思考与探索,比以往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就这个方面,当以蒋寅的《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6)一文为代表。

以上概述显示,对叶燮《原诗》的研究也算有一定的规模,并可以见出这部著作已越来越为学术界重视。不足的是,研究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它的理事情、才胆识力、形象思维等方面,对正变思想关注得并不多,站在当代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它的原创性还做得不够。总的说来,对叶燮诗学思想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二 正变思想研究综述

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对叶燮正变思想给予肯定的是清代人沈樾惠和沈珩。沈樾惠在《原诗跋》中说:“国初诸老,尚多沿袭。独横山起而力破之,作《原诗》内外篇,尽扫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而极论不可明言之理与不可明言之情与事,必欲自具胸襟,不徒求诸诗之中而止。”(《昭代丛书》)叶燮的诗学思想非常丰富,但沈樾惠独独提出盛衰正变,一方面表明了他对叶燮正变思想的认同,同时也强调了它在诗学中的地位。沈珩在《原诗叙》中也说:“凡天地间日月云物、山川类族之所以动荡,虬龙杳幻、魑魅悲啸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贤节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爱恶好毁之所以彰其机,莫不条引夫端倪,摹画夫毫芒,而以之权衡乎诗之正变与诸家持论之得失,语语如雷霆之破睡。可谓精矣神矣!”(《已畦文集》)他认为,叶燮的诗之正变与对诸家得失之

① 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鄢国平和王镇远的《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赖力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都谈到这个问题。

说是“精矣”、“神矣”。精指精华,神指变化莫测,令人惊奇。沈懋惠与沈珩,一说“尽扫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一说“语语如雷霆之破睡”,都给叶燮的正变思想以极高的评价。遗憾的是没有留下进一步解读的具体资料。林云铭在《原诗叙》中对他的论说方式也给予了赞扬,说他是“诗文宗匠,著有《原诗》内外篇四卷,直抉古今来作诗本领,而痛扫后世各持所见以论诗流弊。娓娓雄辩,靡不高踞绝顶,掀扑不破。”^①张玉书为叶燮诗集作序,说它“放废十载,屏除俗虑,尽发筐衍所藏唐宋元明人诗,探索其源流,考镜其正变。”(《已畦诗集序》,《叶燮诗集》卷首)可以看出,正变思想在当时一定的范围内还是得到认同的。对此,叶燮自己也颇为自信:“故窃不揣,谨以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略为发明。”(《原诗·内篇下》)“发明”就意味着创新,但他没有具体展开。直到二十世纪,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叶燮的正变思想。

当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国人开始有文学批评史的意识后,叶燮的正变思想已是一个绕不过的坎,为学者们广泛重视,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虽然第一部文学批评史没有提到叶燮^②,但几年以后,朱东润先生写于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就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叶燮,其中,特别提到了他的正变思想。他说:“旧说以正为尚,以变为不得已,横山破之,以为正变无系乎盛衰,而谓诗之为道,相续相禅,其学无穷,其理日出,此其立说之大纲也。”^③提出以“相续相禅”来破“以正为尚,以变为不得已”的旧说。朱东润看到叶燮对变化中“相禅相续”这一自律方面的重视,并把它提到诗学立论的大纲地位,突出了正变思想在叶燮诗论中的地位。郭绍虞先生也看重这一点,并以“变”为切入点来分析叶燮的全部诗学思想。他将“变”视为叶燮诗学的基础,认为“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是他的重要见解,提出他重视“变”的原因在于“踵事增华”和“陈言既多,则互相蹈袭,在势又不得不不变”,郭绍虞先生以此

① 沈懋惠《原诗跋》、沈珩《原诗叙》、林云铭《原诗叙》分别见于霍松林注释的《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6、85、84页。

② 一般认为,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史是陈钟凡先生撰写并出版于192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没有提及叶燮的诗学思想。

③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75页。

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了“诗之本”、“诗人之本”和“作诗之本”,对“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①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郭绍虞先生主持,霍松林先生校注的《原诗》,其“前言”就是一篇全面分析《原诗》诗学思想的重要文章。针对前后七子以及胡应麟的复古论,霍松林以为,“叶燮的贡献在于他进一步接触到‘变’的某些内容,即比较正确地阐述了‘沿’和‘革’、‘因’和‘创’的关系,从而否定了复古派只要‘正’,不准‘变’,只许沿袭,不容创造的谬论”。但同时也批评他“没有抓住(也不可能)紧紧抓住诗歌发展的社会原因,没有(也不可能)尖锐地揭示两种倾向的斗争及其政治内容”,“只重视诗歌本身”而“陷入‘循环论’的泥坑里去了”。^② 把“因创”与“正变”联系起来,从继承与革新的角度阐释正变。这样的阐释虽然打上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中,也不失为一种新的视点。王运熙先生认为:“‘正’‘变’之说,来源于《诗大序》,而叶燮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揭示了‘变’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③,强调了“正变”中“变”的重要意义。蒋凡先生认为,“叶燮的‘正变’论,可以理解为强调文学发展变化的方法论”,“反映‘失正’时代的诗歌,只要能真正反映出时代精神变化的内在本质,就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的最好继承”,把“正”归结为“反映出时代精神变化的内在本质”,从诗外寻找正变的依据;“叶燮的‘变’就是对‘正’的批判和否定,目的是为了‘救正之衰’这样的否定就意味着新的进步与发展”,“坚持不断进步的发展观,必然导致新文学对旧文化旧传统的突破与否定”。^④ 虽然《叶燮和〈原诗〉》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总计仅八万字,但它梳理了叶燮的诗学思想,是八十年代对《原诗》最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庄锡华在《叶燮〈原诗〉与艺术辩证法》(《人文杂志》1998/1)中,从另一角度解读“正有渐衰,变能启盛”,认为“正”是事物经由筛选、优化,趋向稳定的状态,在现代哲学术语中就是肯定;“变”是事物内部矛盾激化,快速转化的状态,“变”是绝对的,在现代哲学术语中称之为否定。其他的还有如张文勋在《叶燮的诗歌理论》(《古代文学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495页。

② 霍松林:《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③ 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④ 蒋凡:《叶燮和〈原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3、66页。

研究丛刊》1981/1)一文中,将“正变”与刘勰的“通变”比较,得出历史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的观点。毛时安的《叶燮〈原诗〉的美学意义之我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1)重视其正变,认为全书以“变”“革”为宗旨,提出一系列范畴,如正变、因创、沿革、源流等,认为诗的生命力就是“变”,正、变常常处于逆态对应之中;美学风格和审美情趣的变化,给文学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这就是“变而启正”。滕咸惠的《叶燮诗歌理论述评》(《山东大学学报》1994/2)认为,如果叶燮的诗歌发展观的核心是“变”字,那么,“变”的灵魂就是“创”。蒋寅在其《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6)中重新审视《原诗》中的文学史观问题,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他诸多文章虽然也涉及到正变,但基本上没有超出以上的范围。

另一方面,对叶燮诗学思想的质疑者也表现了对正变思想的关注。如黄葆真等认为,叶燮的文学史观是“肯定发展变化的”,但“道不能变,温柔敦厚不能变,雅不能变。……那么所谓变,也就只能是正统封建文学内部的因革周流了”;继而直接指出正变思想的局限性,认为“从这种历史观中所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在封建之道的原则下去‘踵事增华’,使封建社会不断地改良和完善。……这既不是正确的历史观,也不是正确的发展论”。^① 张少康先生在《叶燮文艺思想的评价问题》(《苏州大学学报》1983/4)中提出其发展论的缺陷:一是唯心主义历史循环论较突出;二是没有见到“世运”对“文运”的根本性影响;三是“踵事增华”的观点来自萧统的《文选序》,但运用时有形而上学的一面,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复杂性。虽然后来批评的语气有所缓和,但对之评价不高仍是张少康先生一贯的看法。^②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对叶燮评价很高,说他是康熙时“自成一家”的第一人^③,遗憾的是没有提到他的正变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8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寅宾《谈正

① 黄葆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81页。

②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346页。

③ [日]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